

結語

在瀏覽過市場經濟和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後，我們已能理解經濟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的差異。這差異並不完全表現在議題內容，而在於議題存在的上層條件。對亞當史密斯而言，經濟議題的分析必須要顧及人類文明的發展，有就是，人類文明的發展是經濟分析的前提。或許這意義不易理解，布坎南的說法可白話些：經濟分析只是憲政下的政策分析，而其上是憲政選擇的分析。憲政選擇就是政經體制的選擇。不同的政經體制，決定了經濟分析能選擇的政策範圍。類似地，改用海耶克的話，經濟分析必須要在遵循原則下進行，而不能採權宜政策。最後一篇的兩章也都指出，忽視或凌越憲政約制的政策是導致各國的經濟危機的元兇。

在這層認識下，我簡單地陳述當前台灣、中國大陸與全球的所面對的政治經濟議題作為本書結語。

台灣的議題

由於長期關注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，大部分的台灣人不免會對比兩岸在經濟、軍事、人口的相對規模，心理上總覺得台灣只是個小島。這心理魔障會窄化我們對於未來遠景的規劃。在討論未來的政經議題之前，我必須先掃除這心理魔障。

就土地面積言，台灣真的很小。看我們的鄰國，菲律賓的面積超過我們的八倍，越南超過九倍，日本超過十倍，即使分裂的南韓都有我們的三倍大。土地廣，軍事防禦就具備縱深條件，不過，國防安全非本書內容。土地廣的其他優勢還有豐富的礦產蘊藏和廣大的農業耕地，但這兩項並不是近代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。再就人口規模言。菲律賓超過我們的四倍，越南超過三倍，日本超過五倍，南韓也有兩倍多。但若參照其他的國家，如澳大利亞的人口數和我們相近，又如北歐四國（芬蘭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麥）的總人口數剛好等於台灣（也就是 2300 萬人），人口數目也不是會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。

北歐四國的政經體制讓其百姓幸福快樂又享有自由與尊嚴，可說實現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理想國。在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，它們矗立在自由世界的最前線，

緊鄰蘇聯，最後卻見證了東歐共產集團的瓦解。今天，它們是許多大國在反省政經體制時的楷模。套用一句古諺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從政經體制來說，北歐四國並不是小國。

類似地，台灣在冷戰時期的經濟發展也曾是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，包括南韓和中國大陸。接著，台灣在 1980 年展開的民主化，也是華人世界常掛在口邊的政治發展楷模。1980 年，中國也開始經濟轉型。由於中國走在蘇聯集團之前開放經濟，而且人口規模龐大，也就吸引全球政經學者的眼光和研究。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曾吸引過全球政經學者的眼光和研究，但在這時期的政治轉型的確是被忽略了。這是很遺憾的，因為它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價值遠高過其經濟改革經驗。

台灣在展開經濟發展不久，就逐步在推行政治民主化。民主政治若運作良好，可以確保自由市場的發展；若運作不好，整個社會就會陷入負和賽局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，台灣並未打造類似於南韓的大財團，而是出現一群被稱為螞蟻雄兵的中小型企業。他們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，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推手。在民主化早期，他們還無力對抗擁有黨國資本的威權政府，只能默默地發展他們的事業。他們在經濟範圍內當家作主，安排工人生產，自負盈虧。

隨著民主政治的深化，在野黨勢力興起，但嚴重缺欠政治資金。不久，威權政府下台，黨國資本的運作也大為收斂。一些成功的企業在經過長期的經濟成長後，已經壯大成為大財團，開始有能力影響政策的決定和政治的運作。也由於財團力量開始操控政府的產業政策，勞工運動隨之興起。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開始受到擠壓，一邊是政府政策對大財團的傾斜，另一邊是勞工運動對政府政策的要求。台灣是否有能力發展出政治權力不能凌駕經濟運作的新規則？如果無法形成新的規則，未來的政治經濟情勢就只會在財團資本主義和民粹政治之間搖擺，甚至可能惡質化到兩者的聯合控制。

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在西方的政經史上是同步發展。百姓隨著經濟發展而要求更多的政策決定權力。衝突不是來自長期累積的怨恨，而是薪資與物價的變動。過去，西方社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解決，點點滴滴地累積出全民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。台灣如果能形成一些規則，其內容是否同於西方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規則？

其次，中小企業曾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幹。一度是滿街都是的董事長、總經理造就了勞資和諧的均富社會。但隨著東歐和中國大陸的開放及經濟全球化，中小企業所承受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日增加。為了提高競爭力，台灣的企業與政府都有意提升企業規模。南韓以政府補助去發展大財團，而台灣企業的可貴在於源源不絕的創業家精神。中小企業在發展成大型企業過程中，如何避開政府補助的誘惑，繼續發揮其創業家精神？

最後，兩岸關係是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。關係是一套雙方共同發展和情願遵守的規則。台灣和中國大陸如何去發展出這麼一套規則？台灣的原則又該是什麼？讓我們從一則報導談起。《中國評論新聞網》曾報導：中國擬建跨越台灣海峽的高速鐵路，預估可將北京到台北的時間縮短到 10 小時。該報導還指出，中國的專家正從兩個面向討論該工程的可行性。第一個面向是路線選擇。目前討論的規劃路線有三條：北線方案從福建平潭島連接台灣新竹、中線方案從福建莆田連接台灣苗栗、南線方案從福建廈門經金門和澎湖連接到台灣嘉義。第二個面向是技術選擇：面對台灣海峽的多颱風和多地震環境，高速鐵路宜採海底隧道，還是跨海大橋？這範例適切地表現出目前兩岸問題的實務性：哪一條路線配合相應的技術是最適的選擇？

在接受務實的前提下，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連接兩岸之高速鐵路的議案選擇問題。如果將問題提高一個層次，興建連接兩岸的高速鐵路也就只是上層議案「擴大兩岸經濟往來」的一個選項。在這新議案下，其他可能的選項還包括：擴大兩岸往來的飛機航班、開放並提升兩岸的船運航班。那麼，哪一選項能讓兩岸的經濟往來達到最大化？但是，為何要擴大兩岸的經濟往來？若層次再往上推，新的議題便是：促進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。這議案下的選項，除了擴大兩岸經濟往來外，還有其他的可能選項，如發展成東南亞各國的帶頭者、推動台灣與日本的經濟一體化等。當然，兩岸統一也會是一個選項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，兩岸議題是一連串層次的議題與選擇問題，上一層次的選擇決定出下一個層次的議題。繼續拾級而上，在思考如何促進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之前，我們會反問自身：追求長期經濟成長的目的何在？這反問可得出最上一層的議題：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體制。我們是否要將台灣發展成一個由人民自己

決定自身福祉的社會？還是一個要求人民把自身福祉信託給政府的社會？因此，在探索兩岸問題之前，我們得先確定自己的政治經濟體系。

中國大陸的議題

中國大陸擺脫計劃經濟的嘗試，可上推到文革時期發生在江蘇南部地區的鄉鎮企業。費孝通（1987）認為那是趁著文革的混亂才有機會發展出來的，是民間長成出來的新產權制度。¹ 隨著經濟發展，中國大陸各界逐漸了解市場的發現機制，也開始明白市場的發展程度決定於私有財產權的範圍。當前中國的混合產權體制雖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破蛹，卻是進一步發展的障礙。如何從混合產權體制走向更寬廣的私有財產權體制，則是中國今後體制變革的焦點。

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允許私有財產權和發展民營企業開始。之後，經濟體制並未進一步變革，國營企業仍控制主要的資源和基本設備市場，金融產業也幾乎全都國營。雖然一般性商品市場還算自由，但勞動力的移動並不自由。私有財產權在都市受到較高的尊重，但農民對其居住和耕作的農村土地卻還未擁有私有財產權。當前的體制離自由經濟還有一段長路。

可以預期地，繼續的體制變革將比第一次體制變革更為艱辛，因為支撐專制極權政體的人本主義，也就是傳統文化的聖王、明君、善治、仁政等思想，早已經由章回小說、稗官野史、影視戲劇等滲入百姓的政治思維。改革開放之前的極端公有制導致極度貧困，也導致人們對體制變革的要求。當時的極度貧困現實讓中國政府不得不放手一搏。隨著私有財產權範圍的開放，社會走向繁榮，也走向一定程度的穩定。

對於百年中國的卑微和改革開放前的極度貧窮還有記憶的人們，對已經壯大還在成長的經濟體制，即使不滿意也還仍可接受。由於參考點較低，他們大都只要還能看到個人所得的繼續成長，並不反對在分享大國崛起的榮光下接受專制政權。但是，年輕人已經沒有上述的記憶，他們的參考點是西方大國下的個人生活水準和自由與民主的權利。中國的新一代已經清楚知道，國家富強不一定要犧牲個人的權利。中國與西方大國同樣都可以達到富強，那麼，犧牲個人的權利的體

¹ 費孝通（1987）。

制必定不是較佳的，也一定還存在可以繼續改進的空間。只要改革的理想普遍存在，百姓與政府就必需同心協力去實現共同的目標。然而，一旦百姓與政府的生活與認知分屬兩個群體，這兩群體就無法同心協力，而只能經由政治交易與政治契約去成就共同的目標。的確，中國進一步體制變革的困難度是較前一次更為艱難。

全球的議題

自蘇聯解體後，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已發展成普世價值，開放政策也成時代潮流。同時，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在全球流通的成本，使得各地的產品、生產因素、人才、技術、資金能夠迅速地流動。原本被切割成塊狀的全球經濟，已緊密結合成一個大市場。在此全球市場裡，各國企業激烈地競爭著。然而，政治疆界並未因經濟全球化而改變，各國政府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政策依舊主宰著境內的經濟情勢。在各國之上，也沒有一個世界政府。於是，各國的政策很容易發生衝突，如美國嚴峻的智慧產權保護、歐洲各國對農業和農民的補助、中國的外匯金融管制等。面對這些衝突，我們自然地問到：在全球化時代，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規則？新規則要如何形成？既然不存在世界政府，是否可繼續期待不受尊重的**世界貿易組織**（WTO）或其他的類似組織？還是讓各地區先形成區域合作模式，再等待進一步的擴大？或者，就讓市場在摸索和調適中長出新的全球交易規則？

世界市場已經形成，新商品和新產業很快地就進入邊際利潤為零的完全競爭狀態。為了不斷獲取新的獨占利潤，各國政府和各廠商都積極於創新活動，尋找知識上的突破。創新活動多了，**熊彼德**（Joseph A. Schumpeter, 1883-1950）所稱的**創造性解構**（Creative Destructions）現象也跟著增加。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變革是不連續的。每一次的變革的發生，消費者和廠商都需要一段時期去調適。當創造性解構接連出現之後，每個調適期都會被壓縮到很短，形成個人在生活上的巨大風險和壓力。這些風險與壓力透過民主化的操作會轉變成選票，迫使政府擴大支出和提升對市場的管理與干預。

譬如2007年美國次房貸風暴，就起因於美國政府以非預算方式干預房屋市場，讓高風險的低收入戶也能輕鬆地從貸款到市場中購買房屋。這些不良的貸款經由紐約華爾街投資銀行以創新金融商品方式包裝，行銷給各國金融機構。當市場利率上升後，先是直接引爆房貸危機，接著經由金融商品引發華爾街金融危機，就再傳遞到各國形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。由於金融槓桿操作的規模超過各國政府穩定經濟的正常能力，在束手無策下，他們一方面實施金融「戒嚴令」，不僅限制各種金融商品和金融市場的運作，並將許多金融機構收歸國有，另一方面大量發行貨幣和壓低利率以期刺激市場。過多的貨幣發行導致通貨膨脹，氾濫的資金開始炒作都市土地房屋、石油、黃金與貴金屬、穀物期貨、棉花橡膠等現貨，並開始囤積糧食。由於早期的布列敦森林協議（Bretton Woods System）以美元替代黃金成為各國的貨幣發行準備，美國發行的巨量美元可以直接從世界各國購買商品與物資，又能壓低美國匯率以利其商品出口。此自利政策徹底違背布來頓森林協議的精神，不僅利用廉價美元收割各國商品與物資，增加了中等國家的貧窮人口，也導致低所得國家的糧食危機。

另外，全球化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和財富的累積，但也快速地消耗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。由於科學進展落後於經濟發展，日益劇烈的環境變化使各國難以適應。捍衛地球環境的全球運動澎湃，其理念和政策要求開始衝擊自由市場的原則。面對這一波又一波的反自由市場的浪潮，政治經濟學是否需要偏向政府干預的方向去調整理論？還是尋找新的論述以捍衛自由市場？